

Opinion

■财经时评

“四位一体”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十七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一拓展,彰显出中国经济社会朝着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更高层次发展。

◎杨俊杰

党的十七大报告有不少新提法。其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尤为引人注目。这一拓展,彰显出中国经济社会朝着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更高层次发展。仅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那将是由粗转精的高质量增长,是中国经济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的一大飞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其实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最佳大

的成就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这其中,就蕴涵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思想。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既是举世无双的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经济实践,也是一系列经济发展新课题。

回头看,中国经济发展探索,有一条清晰的思想主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社会一样存在着基本矛盾,它同样是在基本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这一次,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要努力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政治建设也要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经济建设创造出良好的发展空间,为经济建设提供持久稳定的政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也必然要求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文化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理理也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更高层次的矛盾运动发展。当前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必须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

加强社会建设,就是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

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的重大认识和成果。

就当前而言,必须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作为重点和抓手,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使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已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不断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使“四位一体”形成协调均衡的有效格局,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中国社会就会迈向更和谐、更有效、更文明的新境界。

(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看法

能源法应成为新能源发展的激励法

◎刘效仁

据报道,去年1月24日,跨部门起草组成立,启动立法工作的《能源法》正式稿最近已修订完毕,很快就向包括民营油企在内的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公众不仅对《能源法》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寄予了厚望,更对其能否成为新能源的激励法充满期待。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科技创新国际论坛”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部长郑斯林表示,能源问题对中国而言显得尤为紧迫和必须面对。中国人口众多,能源消耗基数巨大,加上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生产、生活对能源的需求在迅速扩张。数字亦显示,2001年以来,随着经济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每年都高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能源消费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4.75%,却只生产了占世界经济总量4.2%的GDP。同一时期,美国使用22.18%的世界能源消费量生产了29.57%的世界GDP总量。中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同年达到创纪录的44.7%,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中国石油供应的持续性。

开源节流,似乎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对于节能减排,中国政府业已做出了很多硬性规定。“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要减少10%。两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可以说是对政府的庄严承诺。所幸的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已经于今年6月26日分组审议节能降耗法案草案,有望为此提供法律保证。

与此同时,开发新能源同样成了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我国新能源的发展之缓慢,颇令人忧虑。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一文中指出,以核能、太阳能、风能和沼气为代表的新能源年增长速度虽然已超过30%,但“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为主,新能源的发展速度和水平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

事实上,国人对于新能源大有“叶公好龙”的心态。“可再生资源听起来很好,又不污染,但是价格很高。”以太阳能为例,它的生产成本是传统能源的5—10倍,在没有额外补贴时,企业是没有能力和动力去做非理性投资的。而太阳能、风能所带来的电力在市场上更是不具备竞争力。有人曾经测算,风力发电要在0.6元以上才具有投资吸引力,但是这样高的价格早吓跑了消费者。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就表示,新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发展和利用,与现在能源的价格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现行的评价体制,对新能源也呈现不利的一面。如果从地方政府财政的角度上考虑,很可能是与其搞风能、太阳能还不如去搞小煤矿。

正因此,能源立法必须把建立开发新能源激励机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能源领域的基本法中将涉及能源开发、流通等领域的监管问题,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有望确立。比如,在产权上,将允许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鼓励各类资本投资能源开发和生产领域,并强调要保护其合法权益。事实上,在如何鼓励新能源开发方面,《能源法》立法应给予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支持平台,以充分体现能源相关领域的立法诉求,确立中国能源开发的基本原则,并就能源战略与规划、开发与生产,尤其在财税激励与价格扶持等方面,作出全面合理的制度安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司长许勤曾表示,发改委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技术发展和产业示范,加强新能源体系化建设,从多方面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无论是重点开发可再生能源低成本成套技术,开发核能关键技术,研制成套装备制造技术,大力开展低成本、低效率的能源植物新品种,无论是清洁燃料、照明节能材料产业化,都需要在立法框架内加以规范,才能促使国家对于新能源开发的支持流于口号化,免于随意性。

切实藏富于民 凸现改革紧迫性

◎倪小林

十七大已经胜利闭幕,胡锦涛总书记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再一次表明“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心实意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工作目标,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新的思路,都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充分表明下一步国家将会在“藏富于民”方面投入更多力量 and 精力。

随着我国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财富的分配问题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也是为什么十七大报告凡是提及收入分配问题都会广泛引起公众热议的重要原因。从今年两会开始在经济发展中如何落实藏富于民就曾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原因是我国这组数据在国民收入分配上,的确存在还需进一步深化的问题。根据2006年统计资料,在2005年,我国GDP达到18万亿元,全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8万亿元,但职工工资总额只有1.9万亿元,仅占GDP的11%。除此以外,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下降到11%。这些数据说明在这些年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增长的同时,职工工资收入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也说明我国的财富在工资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占比偏低。

除此以外,近一个时期我国不少经济学家在研究国民收入分配时还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国家和企业储蓄增速明显快于城乡居民储蓄。最近,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又一次提出,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相对上升而居民储蓄率的相对下降,这样下去将会放大高投资和高出口产生的不良后果,要想保持我国经济发展健康,必须下大力气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他还建议未来需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刺激消费。按照以上分析,如果要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真正公正公平,改革和调整分配格局,从一次分配到二次分配在关注公正性的同时,改革的紧迫性也不可忽视。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力争一次分配更加公平公正,到更多人拥有财产性收入,是下一阶段改革分配的主攻方向,这也表明分配收入改革将尽快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将引入多种机制,采取更多的办法,让人们在一次分配中获得的收益,能够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不断增长。

国家统计局专家认为,财产性收入在我国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理由是在我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依然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还比较小,只有2%左右。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为240多元。可见增长的空间相当大,而今年以来随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扩大,百姓财产性收入也会发生变化。由此看来藏富于民在现阶段的内含意已经改变,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而多种分配方式必然依靠多种要素市场去实现,这也符合“创造条件”增加财产性收入的目标。

机构投资者短线操作易加大市场风险

◎冯玉国

据10月21日的《经济观察报》报道,我国基金频繁买卖,基金交易风格出现类似庄股特征的频繁交易行为,例如在2006年业内多数基金公司年周转率在300%到800%,在2007年达到极致。今年上半年基金平均换手率高达23.6%,有的基金在今年上半年换手率高达358.02%,折合年周转率超过600%,有的基金甚至仅一个交易日之后就大量买进某一股票向大量卖出该股票转换。这种做法实际上在增加资本市场的风险,错误地引导人们重投机而轻投资。

在任何一个资本市场,理性的价值投资者都是市场稳定的基石,反之,则容易造成市场的剧烈波动,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在5·30股市深度调整以前,一些私募基金和对风险没有任何防范的散户,疯狂追逐题材股,造成了垃圾股涨势超过绩优股的情况。但是,一旦大盘调整,没有业绩支撑只靠题材炒作的股票迅速下跌,有的跌幅过半,不少投资者损失惨重。

监管层认识到,必须对散户进行风险提示,以改变他们偏重于短线投机的操作习惯,逐渐引导他们选择以价值投资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事实证明,这种风险提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题材股炒作之风骤然下降。

但是,人们过高估计了机构投



漫画 刘道伟

投资者的自律能力,把他们视为价值投资的主力军,直到大量数据揭示出机构投资者频繁短线炒作的真相,人们才大吃一惊,原来,机构投资者也经常偏离价值投资轨道而追逐短期利益,这导致了前段时间权重股的轮番疯狂上涨,引来人们对蓝筹泡沫的质疑。机构投资者以权重股为中心进行炒作,实际上近似于题材股炒作的一个翻版。由此给普通投资者造成的误导作用不容忽视(这里面甚至还隐藏着基金与券商做交易的可能性。比如,某基金从2007年初到2007年6月30日,就为其第一大股东,某证券公司贡献佣金达506万元)。

巴菲特说:“从短期来看,股市是一个投票机;而从长期来看,股市

是一个称重机。投资的一切秘诀在于,在适当的时机挑选好的股票之后,只要它们的情况良好就一直持有。”中国证监会一直坚持不懈地对股民进行风险提示和风险提示,事实上,推广价值投资是帮助股民最大限度规避风险,获取稳定收益的捷径。如果中国股民具有了巴菲特那样的价值投资理念,就不会常常去犯追涨杀跌的错误,也不会因为跟风垃圾题材股而遭到惨痛损失。

当然,这种风险提示不能局限于散户投资者,更应严格地规范他们的投资行为,众多机构投资者的短线行为很容易形成从众效应,即由于群体的压力,个体不知不觉地在认识和行为上和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现象。这一现象容易助长股市暴涨暴跌现象,加大市场风险。

■上证观察家

中国绝对不是通货膨胀对外输出源头

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为典型的输入型,中国不仅不是通货膨胀对外输出的源头,而恰恰是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徐明棋

中国最近物价指数的上涨不仅引起了国内民众的关心,也使世界为之关注。最近一期美国《时代周刊》刊载了Austin Ramzy的一篇文章为“中国下一宗大出口:通货膨胀”,其他媒体如《国际先驱论坛报》以及一些网站也都纷纷转载或发表文章,对中国通胀问题对世界的影响进行分析。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反映了中国经济指标的变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的变量。但是,文章更多反映的是作者观点的片面性和对世界经济运行基本规律和机制的浅薄认识。

中国最近物价上涨是事实,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继续增加也不假,中国出口商品因此可能会涨价,从而使进口中国商品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进口商品价格跟着涨价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事。但是,就此说中国出口通货膨胀,不仅毫无根据,而且有颠倒黑白之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为典型的输入型,中国不仅不是通货膨胀对外输出的源头,而恰恰是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中国在全球资源性商品不断涨价的近年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途径,保持了近10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稳定,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保持低通货膨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就是在中国工人拿着比较低的工资,为世界市场生产价廉物美商品的时候,发达国家却不断指责中国对出口商品提供补贴,指责中国企业低价倾销,不断对中国出口商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和制裁,并且在经济不景气时还曾耸人听闻地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现在,这些指责余音未了,截然相反的反向评论又在吸引人们的眼球。

其实,稍有国际经济常识的人都不难判断,中国在全球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出现通货膨胀率走高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当前的物价上涨的首要原因是外汇输入而引起的货币供应的扩张。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际收支连续出现顺差,最近几年顺差的规模更是不断扩大,顺差扩大的结果就是外汇的流入,在输入外汇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将美元贬值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也一起输入了。当然,通过央行的政策操作可以对国内通货膨胀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规模地干预的同时,也在货币市场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但仍然有十分可观的外汇储备无法冲销,成为基础货币的投放。为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央行今年已经连续提高了八次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但是由于输入的外汇量过多,货币政策的效率被大大削弱。

尽管以CPI衡量的物价水平表现出明显的上升,由于不是因为国内需求过旺引起的物价上涨,所以人民币就出现了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特殊现象。它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通货膨胀也不一样,不会出现抢购和挤兑存款的现象,而且基本物资供应仍然非常充足,只是一些生产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商品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涨价。

对于国外舆论所关注的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价格上涨的问题,我们也不否认。它是在物价上涨后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起的,因此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在下一个阶段也将发生作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其他生产成本早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前就已经大幅度提升,从石油到有色金属,再到铁矿石等几乎所有的基础性原材料都在大幅度涨价,中国劳动力再不涨价就会违背基本经济规律,不利于中国劳动力的再生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物价上涨中的结构性因素也不能忽视。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以及农村人口结构改变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机会成本的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一些基础副食品和农产品价格在近期上涨的幅度比较大,这是被延迟出现的“巴萨效应”。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储备巨大,使得巴拉萨与萨缪尔森所描述的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快,工资上涨也快,最后带动非贸易部门工资上涨,并使物价总体水平上升的过程长期没有在中国出现。但是基本经济规律总要发挥作用,“巴萨效应”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而并不能就此可以得出

中国将出口“通货膨胀”的结论。

可能还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即使是输入性通货膨胀,也是过分压低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所造成的。实际上,这种看法有些偏颇。第一,通货膨胀可以在一国货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出现,例如,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出现过日元大幅度升值同时物价明显上涨的情况。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不能遏制外部投资资金的流入,我们同样会面临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上升的压力。第二,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外汇计值的涨价幅度可能会更大,与目前比更有可能被歪曲为输出“通货膨胀”。第三,美元是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国际货币,是美元不断贬值引起全球以美元计值的商品与劳务价格大幅度上涨,因此有能力输出通货膨胀也只有美国一家。我们不管采取何种汇率制度,要想避免以美元计算的通货膨胀都是不可能的,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其量也只能隔离一部分贸易资金的流入,而结果可能是出口减少,失业增加,通货膨胀仍高企不下。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